

明中期地方官員與王學學者的緊張

——以白鷺洲書院興廢為例

台灣大學
歷史研究所 張藝曦 ①

摘要

本文選擇明中期王學最盛的江西吉安地區，以白鷺洲書院為中心，討論地方官員與王學學者之間的互動與角力，觀察地方官員在強大的王學學術圈中所扮演的角色，以及官方意識形態與王學之間的關係。文中將集中討論知府以上職級的官員與王學學者之間的交涉，從中可見王學學者如何利用他們地方基層的力量，在官方壓力下一次次突破僵局。文中也將證明，明萬曆年間張居正禁毀天下書院的行動，並非毫無限制的破壞，而須考慮到書院的產權問題。而這場全國性的禁毀行動，更使政治與學術的衝突白熱化。以吉安白鷺洲書院為例，由於王學不利科舉的說法甚囂塵上，逼使王學學者必須與官方合作，而加速書院官學化的過程。

關鍵詞：王學 講學 書院 張居正

一、前言

明中期以後王學的興起與流行，在明代思想文化史上是一個十分突出的現象。由於王學在社會上的迅速發展，以及各地頻繁舉行的講學與講會活動，使得當時學術文化活動異常繁榮，而書院作為宣揚王學的傳播管道，在其中扮演十分吃重的角色。中央政府為了抑制王學的發展，曾經兩次下令禁毀天下書院，●一次是萬曆年間張居正（1525—82）主政時，據說總共禁毀六十四所，一次則是天啟年間魏忠賢為了對付東林黨而行，這次破壞的程度更廣。終明之世，學術與政治之間的緊張是很明顯的。

在這篇文章中我選擇當時王學最盛的江西吉安這個地區，以白鷺洲書院為中心，討論地方官員與王學學者之間的互動與角力。明中期王學興起以後，吉安是幾個王學最盛的地區之一，我們所熟知的幾位王學學者如鄒守益（1491—1562）、羅洪先（1504—64）、歐陽德（1496—1554）、聶豹（1487—1563）都出身於此，而青原、白鷺講學也盛極一時。吉安作為王學的發展中心之一，儘管初期地方仍存部份程朱學勢力，但隨著王學勢力的擴展，程朱學在當地迅速退潮，●直到明末，吉安一地未再見著名程朱學學者。王

學在此可謂一枝獨秀。也因此吉安王學的發展，不僅有其代表性，也有其特殊性。在此我們不會看到不同學派、不同學術立場的學者之間的分合、爭衡，反而是地方官員在這個強大的王學學術圈中所扮演的角色，以及官方意識形態與王學之間所呈現的關係。

所謂「地方官員」，至少包括知縣與知府兩個職級的官員，在本文的使用中，還包括巡按、巡撫這些由中央派駐地方的官員。文中我將暫時以職級為標準，區別知縣與知府以上的官員，而集中討論知府以上職級的官員與王學學者之間的交涉。從中我們可以看到，王學學者如何利用他們地方基層的力量，在官方壓力下，一次次的突破僵局。文中也將證明，傳統官僚組織雖然掌握豐富的行政資源，但在處理敏感議題時仍有其規則脈絡可循，即便如張居正禁毀書院這種大規模的政治行動，也不能毫無限制的恣意破壞，而須顧慮到書院的產權問題。

最後我將討論，這場全國性的禁毀行動，雖然未能扼殺王學的發展，但卻可能使政治與學術的衝突白熱化，並且捲入意識形態之爭中。文中以白鷺洲書院為例，指出在禁毀書院的行動後，王學不利科舉的說法甚囂塵上，逼使王學學者必須與官方合作，而加速書院官學化的過程。

一、王學在吉安

如黃宗義所說：「陽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」，^①王學的創始者王守仁（1472—1528）中年在龍場驛徹悟「知行合一」之旨後，晚年不僅學術更趨圓熟，不斷提出新說，加上

晚年官跡又集中在江西附近，建立卓犖的事功。因此其人其學對江西都產生深遠的影響。

江西南北共十三府，其中南方的吉安府受王學影響最深，著名的王學學者也最多，以這些學者為中心，形成《明儒學案》江右王門的主幹。

明初以來，吉安府在功名科第的表現就相當耀眼，不少任職中央的顯宦，包括首輔楊士奇（1365—1444）都是出身此地。^②儘管科舉表現不弱，吉安士人對理學的興趣卻發生很晚，遲至成化、弘治年間，才有著名理學學者羅倫（1431—1498）出現，而相對於江西西北部吳與弼（1391—1469）等人不求仕進的作法，羅倫對功名的態度則是比較積極進取的。這與吉安本地重視功名的風氣有關。

成、弘年間的吉安，不僅有學者羅倫，同時如羅僑（1463—1534）受業江西西北方的張元禎（1437—1506）門下，^③而吉安、廣東因為地緣相近，新會陳獻章（1428—1500）也在此地有收弟子。^④儘管這些人在理學上的立場彼此不盡相同，其學術內容也未必與後來的王學有深厚淵源，但卻使原本理學風氣不盛的吉安有更多親近理學的可能。

雖然，王學進入吉安的契機，還在於王守仁平定宸濠之亂這個偶然的事件。明中期以來，江西南部的南安、贛州二府的地方盜匪與動亂問題，一直都是困擾官方的棘手問題，等到正德年間王守仁任南贛巡撫時，首先平定地方動亂，同時實行南贛鄉約、十家牌法，重新組織、穩定地方秩序，才有效解決了這些問題，也因此獲得南贛地方士民的擁戴與歡

迎。而緊鄰位於南贛之上的吉安府，長期以來既為南贛盜匪所苦，如今也因心腹大患得除，而對王學存有好感，因此不少南贛與吉安士人都紛紛歸入王守仁門下受學。

正德十四年，南昌的寧王宸濠起兵作亂，所到之處，有如摧枯拉朽，江西各府地方官員根本無力與抗，此時王守仁以巡撫的身份，不僅有效統籌調配各級官員抗敵，並且調動江西各地可用軍隊幫助平亂。鑒於北方屬於宸濠的勢力範圍，王守仁更南下尋求吉安仕紳的支援，而吉安仕紳如鄒守益、羅循、曾直、羅僑、李中（1478—1542）、張鰲山不僅及時予以協助，且赴王守仁營中聽候差遣，吉安知府伍文定亦全力協助平亂工作。^⑧從中我們不難看出王守仁在吉安當地厚植的勢力。^⑨

值此軍事倥傯之際，王守仁仍然不忘講學。此時許多士人紛紛前往拜訪問學，王守仁一面平亂，一面且廣開講學之門，與士人講求心性學術，這種行為固然表現出他心性涵養工夫的高明，但也意味王守仁正利用此機會擴展其學術勢力。江西文教最盛的地方，北有南昌，南有吉安。王守仁擔任南贛巡撫期間既已在南贛、吉安取得支持，此時更將其勢力擴展到北部，進而遍及江西全省。^⑩

王學勢力雖在江西迅速竄起，但分析其進入吉安並能深植地方的關鍵，還在於取得當地世家大族的同情與信任。諸如安福的劉氏家族、鄒氏家族的擁護，使王學在安福的發展十分順利，而吉水羅氏與泰和歐陽氏家族的支持，也是王學能在兩縣紮根的重要原因。永新尹臺轉向王學，更是王學能

在永新更深入發展的重要關鍵。王學與地方家族的複雜關係，在此無法深論。^⑪總而言之，宸濠之亂的外在因素，以及王學與地方家族合作的內在因素，使王學在吉安迅速發展，並逐漸變成當地的主流學術。

以下我將使用王學學者來概括稱呼吉安這批著名的王門弟子。這些王門弟子除了少數幾位例外，大多是擁有功名且擔任過官職的仕紳階層。由於仕紳往往在遭黜、居喪或致仕居家期間最能發揮對鄉里的影響力，因此我們在下文中所看到在地方上與官方互動角力的王學學者，泰半是那些暫時從職位退下居鄉在家的仕紳。地方官員與王學學者並非兩個截然不同而異質的身份群體。

吉安共分九縣，廬陵、吉水、泰和、萬安，位於贛江主幹旁，而安福、永新、永豐、永寧、龍泉，則分別有贛江的支流瀘水、禾水、恩江與遂水通過。從一些方志、文集資料中，我們不難發現水路是吉安地區與外界交通最常使用的方法，其中除了永寧僻處山區，萬安與龍泉接近贛江上流險湍急流處而水路難行以外，位於贛江主幹旁的廬陵、吉水、泰和三縣，正是吉安府經濟、文化最發達的地區，安福、永新、永豐三縣相較雖稍遜，但這六縣正是吉安王學講學最盛的地區，書院的密度與舉行講會的頻率都很高，以安福縣為例，據說達到「士不譚道，即恥笑以為非類」^⑫的程度。因此以下的討論便將把焦點鎖定在王學最盛的六個縣治。

吉安各縣都有書院，各縣書院區分為鄉級書院與縣級書院兩種，鄉級書院一般作為一鄉或數鄉士民讀書論道的場

所，縣級書院則供一縣士民講學之用。一縣總有一所或一所以上的縣級書院，且經常是由著名王學學者主持的，如安福有鄒守益的復古書院，泰和有郭應奎的萃和書院，永新有尹臺的崇正書院，廬陵在隆慶以後則有王時槐（1522—1605）與陳嘉謨（1521—1603）主持的西原會館，吉水在萬曆年間則有鄒元標（1551—1624）主持的仁文書院。各縣以其著名王學學者與書院為中心，形成規模大小不等的地方學術群體。此外，每年全府九縣的士人還會同赴青原山舉行全府集會。青原山未設書院，只有講會活動，一般稱為青原講會。以安福縣為例，既有道東、復真、興文、同善、識仁、復禮、中道、宗孔等鄉級書院，又有縣級書院——復古書院。⑬等到「春秋二季，合五郡，出青原山為大會，凡鄉大夫在郡邑者，皆與會焉。」⑭青原講會作為全府會講場所的關鍵地位是很明顯的。

青原山位在廬陵境內、贛江主幹旁，處於吉安地區的吞吐口，向內利用水路既可聯絡廬陵以外的其他八縣，向外沿著贛江而下，更可北往南昌，出江西而達南京，因此在先天交通條件上特別優良。正德初年王守仁擔任廬陵縣令時，曾經借用青原山上淨居寺的寺地為講學場所，後來王學學者便相繼在此聚徒講學，⑮使青原山的地位迅速竄起。

距青原山不遠處就是白鷺洲書院，白鷺洲書院位於白鷺洲上，這是一塊由泥沙淤積而成、約1.5平方公里在江上的小沙洲，由於贛江流經此地會岔為二條支流，有人便借用李白「二水中分白鷺洲」的詩句來形容。贛江以西南東北的走

向，把廬陵切為左右兩塊，左大而右小，往左登岸不遠處就是仁壽山與府城，往右走約幾公里路，就是青原山。自從南宋淳祐元年（1241）吉州知軍江萬里創建白鷺洲書院後，得到宋理宗敕扁，白鷺洲書院便與鵝湖、白鹿洞並稱江西三大書院，也成為吉安地區最負盛名的一所書院。此後元末兵亂毀壞，加上明初官方重學校而輕書院的態度，因此一直任其荒廢未再修復。

嘉靖五年（1526），王門弟子黃宗明（？—1536）擔任吉安知府期間，率先重建白鷺洲書院，作為知府召集各縣士人聽其講學的場所，因此在定位、功能上都與學校系統中的府縣學比較接近。然而黃宗明本身既是王學門人，青原、白鷺位置又相毗鄰，因此也吸引不少王學學者到此聚集，而經常往來青原、白鷺兩地。此時吉安地區的書院、講會正值發展初期，諸如復古書院、連山書院，都尚未興築完成，因此白鷺洲書院很快興起與青原山並稱，成為全府兩大講學中心。

二、地方官員與王學學者的交涉

儘管青原、白鷺並稱，但二者命運卻有很大的差別，原因後詳，在此我想先交代白鷺洲書院的發展。

書院自唐中葉出現以來，經歷宋、元兩代發展，已有數百年的歷史，而由於明初重學校輕書院的政策，不僅南北兩京設有國子監，地方府州縣也都有學校設立，使得學校教育一度大盛，書院教育相對則陷入低潮。此時地方官員往往透過興築學校，或者蒞臨講學，以達到振興地方學風與關心教

育發展的目的。但自成化、弘治以後，學校教育趨於僵化，對士人漸失去吸引力，而給了書院重新崛起的機會。我們看到不少地方官員開始興築書院的文獻記載。如弘治年間泰和知縣楊南金，他便利利用廢毀寺院興建如文溪、龍洲、清風等書院，^⑩而這些書院既是為補學校不足而設，因此多半是由官員親自主持書院的講學活動。另外也有少數書院是地方官員專為地方知名學者所興建的，這些學者雖亦扮演「師儒」的角色，但因學術聲望極高，遠非當時學校教官所能比，因此地方官員就在學校體系之外另闢書院延攬這類學者。

正德以後王學興起，以一套異於官方意識形態的道德學說，吸引許多紳矜士人的目光與興趣，引動整個書院體系的蓬勃發展，也為沈寂已久的地方文教事業注入一股新的活力。為了推廣學說普及民間，王學學者在各地廣設書院，這些書院大多數是王學學者與地方官員合作興建的，而隨著王學講學的蓬勃發展，許多官員也不再親自主持講學，反而逐漸退出書院空間，讓給王學學者使用。原本官員主導的教育權也逐漸轉移落到王學學者手中。

上述情形雖然因時因地而有程度上的差別，但在王學最盛的吉安地區則特別顯著。在王守仁平定宸濠亂後，吉安王學的流行，本已促使當地書院事業的活絡發展，加上一些親炙王學或本身是王門弟子的官員到此任官時，又為地方興築書院，提供王學學者講學之用，許多條件相乘相加的結果，更把整個王學的流行推到高峰。以安福復古書院為例，其前身惜陰會，是王學學者在吉安首次舉行大規模的講會活動，

這個活動是正德年間由劉邦采倡議的，兩月舉行活動一次，一次五日，據說盛況空前，連外地士人也聞風而來。嘉靖十六年（1537）程文德（1457—1539）擔任縣令後，便應鄒守益的請求而建復古書院。程文德，字舜敷，號松溪，浙江永康人，早年學於章懋（1436—1521），後來卒業於王守仁門下，在《明儒學案》中歸入浙中王學學案。而程文德本人雖在書院完成不久後就調任他地，但復古書院從此成為王學學者在安福的講學重地，無論在地方教育與社會上都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。

王學學者雖然逐漸主導當時書院教育的發展，但在講學空間上始終必須依賴官方提供，而難以獨立運作。據曹松葉指出，明代書院官辦與民辦的比例各為83.17%與15.11%，比例相差懸殊，^⑪吉安的民辦書院的比例雖較上述數字稍高，但與官辦書院比例上仍有相當大的差距。書院何以官辦為多的詳細原因目前未能盡知，但應與官方經費較為充足，在興築書院時可以公帑支出或攤派到稅賦上有關，尤其以公權力介入，在土地的取得與建築的維護上也較容易。儘管過度依賴官辦書院的情形，在連山書院、復禮書院這些民辦書院的興建完成後稍有改善，但民辦書院規模既小，又多位於鄉間或山區，交通不便，因此與一些著名官辦書院如廬陵白鷺洲書院、安福復古書院、泰和萃和書院與永新崇正書院相較，仍有一段差距，而難以取代其地位。

也因此，吉安的王學學者在舉行講學活動時，仍然相當倚賴官辦書院的空間，但這種在教育活動上既取代官方角

色，又使用官方空間的情形，雖在各縣未見衝突，但在知府駐紮的附郭縣城廬陵，則因白鷺洲書院的水患問題而引爆。

白鷺洲書院經過嘉靖五年（1526）知府黃宗明主持重建完成後，王學學者往來青原、白鷺之間講學的記載便不時可見，我們大概可以推斷當時青原、白鷺兩地的講學活動十分熱絡。而白鷺洲書院位於沙洲上，從府城走到書院，出入必須涉水而過，因此即使位置靠近府城，但或因顧慮到涉水不便，在知府黃宗明去任後，繼任知府很少再使用這個書院，^⑮而白鷺洲書院也就逐漸變成王學學者聚集往來的場所。

知府退出與王學學者的聚集，到了嘉靖二十一年（1542），知府何其高企圖扭轉局勢，恢復原本知府主持講學、主導教育事務發展的職能。白鷺洲書院因地當贛江支流章、貢、瀘三水之衝，時傳水患，為了維持書院的正常運作，官方往往幾年就必須出資重新修補書院，十分麻煩。何其高持此為由，把書院從白鷺洲上遷建到府城外的仁壽山上，並把山上慈恩寺改建為書院，提供讀書講學之用，同時又因書院已不在沙洲上，所以改名為白鷺書院。^⑯

對於這次遷建行動，地方士人意見不一，有人贊成，但反對的人也不在少數，不過由於文獻難徵，我們已難再稽考贊成者與反對者的詳細姓名與過程。不過很有趣的是，當遷建書院完成後，何其高召集士人來此讀書時，尹臺指出當時「召九邑之士，弗至」，於是「門庭蕭索，鼠雀穿窬，武帥賓使稅館相仍，縣士傷嗟」，^⑰嘉靖二十五年（1546）與三十六年（1557）王學學者更在此舉行全府大會。^⑱顯然以知

府之尊，所訴求又只是恢復明初以來知府在文教上的權力與職能，但仍無法削弱或取代王學學者所建立起的學術圈。

到了隆慶元年，巡按任春元乾脆轉移焦點，另外在書院的產權問題上作題目。由於白鷺洲書院的產權屬於官方所有，任春元遂不顧王學學者的意見，片面決定把廬陵縣學遷到仁壽山書院原址上，而把書院遷到城北孔廟的尊經閣中。城北孔廟距離贛江更遠，交通更不方便，且新居因陋就簡，「規制未甚備」，「諸生無復講肄其中」，^⑲王學門人因此逐漸退出白鷺書院，不再利用此處講學。王時槐後來作《白鷺洲書院志》時，便說「徙非所志」，抗議任春元這種霸道的行為，^⑳而經過這次遷徙，書院也就完全荒廢了。^㉑

從這兩次遷徙，我們看到書院由盛轉衰到完全衰亡的過程。官方利用水患的理由，以及仕紳內部意見分歧的機會，不僅把書院遷離原址，甚至移往更偏遠的地方，而使名盛一時的白鷺洲書院最後竟然淪為廢墟。

對於白鷺洲書院這個廬陵唯一的縣級書院，知府與巡按居然不惜讓書院從此荒廢的做法，與吉安其他各縣知縣對待王學講學書院的態度有很大的出入。知府、知縣由於層級高下有別，在與地方仕紳互動上經常扮演不同的角色，有時甚至可能為此正面衝突，難以善了。在王學聲勢最顯赫時，王門弟子中最知名、爭議性也最高的學者王畿（1497—1582），就曾因在寧國府涇縣的講學活動中接受知縣款待，而驚動知府，害得知縣差點為此丟官。羅洪先也因此寫信痛責王畿這種輕率的行為。^㉒

知縣在整個官僚系統中屬於最低一級的正式官員，直接與民間接觸，管理地方事務，而因其權力有限，經常必須與當地仕紳合作，才能順利推展政務。尤其在像吉安地區，仕紳階層與世家大族的勢力愈大，知縣所承受的壓力也就愈重。如 James B. Parsons 研究指出，明代政府指派南直隸、浙江、江西三地的地方官員人選時，往往有意識的選擇進士出身者擔任，這與三地科舉文風的發達、仕紳階層人數眾多有關。因此知縣本身必須具備相當的條件，才能得到當地仕紳的尊重。^⑤但即使如此，吉安各縣知縣仍然不太能有自己的意見與聲音，必須儘量配合地方仕紳與世族的意見，與其同調。即使如唐伯元（1540—1598）這種積極反對王學的官員，不僅曾上疏反對王守仁從祀孔廟，並以相當激烈的言論批判王學，但在他擔任泰和知縣期間，卻不見有何批判的言論與動作。顯然在像吉安這種王學特盛的地方，激烈反王學者在權衡利害關係下也不得不有所妥協。

也因此，因應明中期以後地方事務日漸繁多的情形，吉安各縣知縣往往積極與地方仕紳合作。而吉安的王學學者在很大比例上屬於仕紳階層，且因講究道德良知之學，在形象上與鄉里豪紳有所差別，容易取得官員與百姓的信任，因此知縣往往也在王學學者的協助下，進行一些地方工作。如嘉靖年間中央政府鑑於地方田賦不均、鄉里豪紳飛詭灑寄的猖獗，遂下令安福縣清丈田畝，安福歷經三任知縣，在鄒守益及其弟子的大力協助才終於完成。由於王學學者力求公平、不惜與豪紳對抗，更使得整個清丈工作的結果非常成

功。^⑥又如吉水羅洪先，也幫助地方推行保甲、鄉約與丈量工作。^⑦因為對王學學者的倚賴之處甚多，知縣對王學的發展不僅不多干涉，且退居監督輔助的地位，一些關心文教且學術立場傾向王學的，更與其共同講學，如前述程文德就是一例。

相對的，知府以上職級的地方官員與地方關係較疏。明中期以後知府幾乎足不出府城，因此與各縣仕紳關係較淡，而其態度、立場也都比較往中央政府傾斜。明初以來官方既以程朱學為正統學術，則在學說內容上特別與程朱學標異的王學，就頗受中央政府的防範與禁抑，包括王守仁本身在死後都被奪去爵位。因此王學雖在各地取得不錯的發展，但中央堅持其官方意識形態而「以學為諱」的態度，卻是王學學者長久以來的隱憂。這種禁抑王學的氣氛雖在王門弟子徐階（1503—1583）擔任首輔時稍有鬆弛，但並未因此消失，所以後來萬曆與天啟年間還發生過兩次禁毀書院的事件。這些職級較高的地方官員既在立場與態度傾向中央，與王學學者之間也就存在一定程度的緊張與矛盾。

這裏我想用對照的方式來說明。如前述唐伯元本身雖然反對王學，但在泰和知縣任上，卻沒有反王學的言論與動作。相對的，與唐伯元同時在任的吉安知府張振之，在任期間不僅希望士人「學必宗朱說」，對於「近世所講習，與朱稍異，則力排之」，並且刊刻《朱子年譜》，以及羅欽順（1465—1547）的著作《困知記》，來與當時聲勢正盛的王學對抗。^⑧羅欽順，泰和人，是跟王守仁同時的著名程朱

學學者，曾與王守仁及其高弟歐陽德往復辨難，不為所屈。所著《困知記》，從理論根本批評王學，而與當時流傳甚廣的《傳習錄》相匹敵。張振之刊刻當地程朱學者的著作打擊王學，儘管當地已無著名程朱學學者，因此沒有與其相呼應的人，但這些動作必然造成與當地王學學者關係的緊張，而他後來遽然棄官而歸，恐怕也與此有關。^⑩

在此，我並不想把這些地方官員與王學學者的關係，簡單的以職級的不同而歸類為相互合作或緊張衝突。正如前文在界定王學學者的範圍時所說的，王學學者與地方官員並非兩個截然不同的身份群體，二者之間其實有許多交集，這是不可能被忽略不看的。不少王學學者本身是或曾經就是地方官員，因此在任期間或者提倡王學，或者乾脆自己主持講學活動。諸如寧國府知府羅汝芳（1515—1588）居官講學，徐階、耿定向（1524—1596）擔任提學使時鼓勵王學發展，都是為人所熟知的事例。相對的，也有一些在學術主張上認同程朱學的學者，如黃佐（1490—1566），則力斥王學，不斷在各方面與王學立異。然而，無論支持或反對王學，他們支持或反對的理由往往與其學術立場有關，而跟政治的關係較小。因此我們應該把這些兼具學者與官員身份的學術官僚，與一般的行政官僚區別開來。在本文的討論中，與白鷺洲書院興廢發展有關的官員，大都是一些沒有特殊學術背景行政官僚，所以本文也就限定在這個範圍討論。

我們把焦點放在白鷺洲書院的問題上，不難看出王學學者與這些職級較高的行政官僚之間的衝突所在。這些行政官

僚本身既無特定的學術立場，其動態、意向，所體現的往往不只是個人的好惡，而更多代表官方的立場，以及中央政府的態度。雙方的衝突首先表現在教育主導權的認知上，後來更由巡按出面，針對王學講學依賴官辦書院的弱點，遷走書院而以學校取代，整個事情的經過與後來張居正禁毀天下書院事件幾乎如出一轍。張居正禁毀天下書院一事，意味了王學講學與官方的衝突，不再只是地方上的問題，而是已拉高變成全國性的議題。王學學者所面臨的挑戰也日益嚴峻。

三、議題的擴大與政治化

萬曆七年（1579）張居正禁毀天下書院，曾經轟動一時，引起後來研究者的普遍注意。一般注意到禁毀的成效、官方與王學學者的緊張關係的白熱化等等。^⑪在此，我想著眼在被禁毀書院的性質，證明當時所禁毀的書院幾乎都是官辦書院，進而我們可以發現從白鷺洲書院的遷徙到後來禁毀天下書院，產權問題都是官方主要的使力點所在。而官方與王學學者之間的緊張關係，更進一步突顯出王學與科舉考試之間的矛盾。

明代書院的興築，集中在正德、嘉靖、隆慶、萬四朝，其中尤以嘉靖朝的比例高達百分之三十以上，可以視為書院發展的高峰。^⑫到萬曆初年張居正擔任首輔時，情勢為之一變。萬曆三年（1575），張居正在《請申舊章飭學政以振興人才疏》中說：「今後各提學官督率教官生儒，務將平日

所習經書義理著實講求，躬行實踐，以需他日以用，不許別創書院，群聚徒黨，及號召地方游食無行之徒，空談廢業，因而啟奔競之門，開請託之路。」顯示張居正干預學術文化事務的決心，而這種文化專制政策所要整頓的對象，則是當時盛行的書院講學。等到萬曆七年（1579），因常州知府施觀民科歛民財以建書院之事，張居正遂下令廢天下書院為公廨，賣院田以充邊需。

這次禁毀究竟成效如何，其實無法肯定。目前研究明代書院的學者，大多引用《明紀》、《明通鑑》的記載，表示共毀了六十四所，但詳細情形則不得而知。^⑤在此，我把範圍定在江南地區：即蘇南（包括揚州）、浙江、江西，搜集不同版本的府志資料與部份的縣志、書院志資料，逐一考察。就目前所知，在這次禁毀行動中受到波及的書院名單如下：

廣德州：復初書院。
寧國府：志學書院、水西精舍、文峰書院、明德書院。
池州府：齊山書院。
徽州府：紫陽書院。
杭州府：天真書院。
紹興府：稽山書院、五雲書院。
饒州府：東山書院。
南康府：陳經歸書院。
廣信府：端明書院、象山精舍、玉溪書院、錦江書院。

瑞州府：筠陽書院。

南安府：道源書院。

吉安府：白鷺書院、復古書院、文江書院、一峰書院。

這些被毀的書院幾乎都是官辦書院，主要針對未得到中央政府同意而官員私挪公款興建的書院，因此地方若能補足私自挪用的公款，甚至可以不執行禁毀的命令。以江西瑞州府的筠陽書院為例，某人出錢「抵其值」，便使書院得以保全，待風聲過後此人更將書院還給官方。再以杭州府的天真精舍為例，嘉靖九年（1530）僉事王臣與王門弟子合建精舍，並置膳田，在性質上應可算作官民合建，等到萬曆二年（1574）官方又增建凝道堂。當禁毀的命令下達時，天真精舍在被毀之列，「精舍亦混為里中所佃」。^⑥整個事件前後的過程我們不甚清楚，但大概可以推敲官方要毀凝道堂與變賣膳田，可能當時精舍已少人利用，時人對於產權的歸屬又不甚清楚，因此連精舍也一起被毀，也因此在張居正死後，政府很快下令地方官員恢復天真精舍的舊觀。^⑦這個例外，也可用來反證在這次禁毀行動中，產權問題確是官方關心的焦點之一。^⑧

官方既然尊重私人產權而只毀官辦書院，但在禁毀的教旨中又明白地指出毀「私創書院」，這裏必須釐清「私創」所指為何。根據萬曆七年（1579）因施觀民科歛民財事，吏部題復：

（施觀民）其所創書院，并各省直有私建的，著遵照皇祖明旨，都改為公解衙門，田糧查歸里甲，再

不許聚徒遊食，擾害地方，各巡按御史，仍將查過緣由，立限從實具奏，……」

同年七月，吏部又奉旨：

該省書院，應存留改建改正等項，俱依擬，其田糧除白鹿洞，留三百畝供祀外，其餘都召民上價承買，各歸里甲，辦納糧差，仍將召買價數，并歸入里甲緣由，類造覈冊，報部稽查，各省直都照例行。

十月又旨：

今後巡鹽御史再不許仍立書院名色，曠廢本職，聚徒講授，致滋奔競、囑托之弊，如違，回道之日，聽本院考察參奏。^⑦

根據以上資料，官方處置所禁書院財產的方式，很明顯是把這些財產視為己有，故將院田賣給民間百姓，而所謂「私創」，應指地方官員未曾上報便擅自動用公帑興建書院而言。萬曆十年（1582）禮部答覆鄒元標要求復建書院時說：

私創書院已經拆毀者，不必概復，如果有先賢所遺或係本朝建者曾經拆毀，量為查復。^⑧

便把「私」放在相對於奉旨敕建的「公」的位置上。

吉安在這次行動中，共有白鷺、復古、文江（即後來的

仁文書院）與一峰書院被毀，其中白鷺書院在隆慶年間已廢，因此官方只須把扁額改為湖西公署，沒有進一步的破壞行動。^⑨而一峰書院所在地點既僻且遠，本不會被毀，但因羅倫當年曾經上疏力阻首輔李賢奪情起復，而張居正又正因奪情受到輿論的譴責，因此特別針對羅倫毀其書院。^⑩除此以外，官方所毀的都是靠近城市的官辦書院。這次的禁毀幾乎就是遷廢白鷺書院的翻版，但是範圍更大，全府、全國的書院都牽連在內。更重要的是，從嘉靖朝一些零星的個案，到如今官方傾全國之力、大規模的壓制，對於王學學者確已造成相當大的壓力。

四、學術與科考的緊張

張居正死後，吉水鄒元標首先提出恢復書院舊觀的要求，得到中央政府的部份同意。吉安的復古書院與仁文書院，都在地方知縣的支持下很快又重新修復完成，但白鷺書院則依舊任其荒廢。

早在任春元遷徙白鷺書院前，地方士人似已警覺到知府可能利用產權干涉書院事務的危機。當時廬陵除了白鷺書院以外並無其他可用書院，因此以陳嘉謨、王時槐為首，開始自行計劃設置私人會館講學，陳嘉謨等人首先捐款買地，在許多士人合作下，歷經十餘年的時間，終於創立西原會館。西原會館位於廬陵縣城城外的郊區，地緣上與贛江接近，與鄰縣聯絡也較方便，且因屬於私人產業，未在禁毀書院的風波中受到波及，因此創立以後迅速興起，成為廬陵當地的講學中心，聚集會講的人數據說可達千百人之多。

當初遷廢書院，本意是不讓王學學者繼續利用書院講學，並希望振興學校教育，如今白鷺書院依然荒廢，學校又難吸引士人就學，反令知府失去可以召集士人講學的空間。相對的，廬陵的王學學者卻可以退到私人空間如西原會館中繼續活動。於是，余之禎在萬曆十年（1582）擔任知府後，本身既關心文教發展，但面對久已荒廢的白鷺書院又無法可施，於是乾脆轉移陣地，參與西原會館的講學。^⑪也許是鑑於王學在吉安學術圈的影響力，余之禎在上任後便積極拉攏王學學者，目前流傳下來的萬曆《吉安府志》，就是他委託王時槐、劉元卿（1544—1609）與羅大紘等人修纂的。

與王學學者合作，似乎是一個不錯的方式，與吉安知府轄區相重疊的廬陵知縣錢一本（1539—1610）也有類似變通的方法。錢一本是常州武進人，屬於東林學派的中堅，其學術立場傾向王學，在萬曆十一年（1583）擔任廬陵知縣時便積極向王學學者王時槐問學求教。當時他面臨兩個難題，一是欠缺一個屬於官方的公共講學空間，一是以其知縣身份，在當地學術圈又無知名度，無法吸引士人前來聽講，因此錢一本一方面毅然捐出薪俸，修復城北孔廟的白鷺書院，一方面力邀王時槐共同主持講學。^⑫王時槐是安福人，但活動地點多在廬陵，隱然是此地的學術領導者。這次講學的情形並無多少資料流傳下來，但似乎只在錢一本在任時運作一段時間，不久久便停擺了。

王學的處境在此時似乎逐漸好轉，但更大危機正醞釀而

逐漸浮現出來。

王學在吉安流行之初，參與講學成員的身份不一，包括地方官員、紳、矜、處士、百姓各式人等都有，書院則被視為一個在學校體系外講學論道的場所。而王學學者講究良知、萬物一體，因此能夠打破身份界限與百姓親近，並為其謀利的行為，得到地方士民普遍的認同與推崇，也因此奠定了王學學者在地方上穩定的基礎。

然而，何其高企圖介入、主導白鷺洲書院講學的運作，首先突顯了教育權的歸屬問題，此後任春元遷廢書院，更在書院的官辦與民辦之間劃了一條界限。緊接著禁毀天下書院，張居正一方面反對王學學者聚眾講學，一方面阻止其使用官辦書院，整個禁毀的行動，很具體把官方意識形態與非官方學術區別開來，王學被列入非官方學術中，站在官方意識形態的對立面。於是，參加科舉考試與學習王學也被分開來了。

因此，原本只是地方官員與王學學者之間，在教育的主導權與書院的空間使用權上的角力，而儘管地方官員也曾以政治力量介入，但其身份與代表性，尚不足以把事件拉高擴大到意識形態的層次。然而，一旦中央政府不僅正式表態，並且以禁毀書院這種激烈異常的行動，把禁抑王學的態度傳達到全國各地時，同時命令全國地方官員共同禁抑王學，不僅使得王學與官方意識形態的矛盾完全公開且檯面化，而且這種訊息的傳播也將因禁毀的行動而迅速蔓延開來。在此可以一個例子來作說明。馮柯（1524—1601）的《求是

篇》，與羅欽順的《困知記》和陳建的《學蔀通辨》齊名，被視為明中期抨擊王學最力的著作之一。但當馮柯完成這本著作後，萬曆二年（1574）來到南京請在當地任官的族人作序時，卻因「新學方盛，謝不敢」。馮柯又透過這名族人的關係，請這名族人的老師李春芳作序，李春芳雖然接受委託，但在序中仍然不敢明白稱讚此書。等到經過禁毀書院、張居正退位一連串的政治事件後，馮柯的兒子馮挺在萬曆十三年（1585）致贈一套馮柯的《貞白全書》給自己的座師孫繼皋，卻很快收到回信，信中說到：「尊公全書出以觀人，人無不奉若枕中鴻寶者，求是編爭借傳寫幾遍。」在後來的一封信中又說：「所云爭借傳寫幾遍者，非是異新建者，乃是附新建者，尤可見公是之在人心者，未嘗泯，而即護法高足，竟亦不能阿所好也。」^⑩從禁毀書院前因為「新學方盛」不敢作序，到禁毀書院後原本「附新建者」如今爭借傳寫，很明顯的學術風潮已有轉變的跡象，同時也顯示王學勢力正在逐漸消退之中。當時王學勢力的退潮，當然有許多複雜的原因，無法一一討論。從學術的角度來看，當時其他學術勢力的興起，與王學競爭甚至反對，相當程度威脅到王學的發展。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王學學者周汝登與許孚遠（1535—1604）在南京辯論無善無惡的問題，雙方各有支持者，互不相下。^⑪許孚遠與後來的東林學派有關，而東林學派正是晚明批評且修正王學的一股重要學術勢力。在政治方面，禁毀書院則是另一項重要事件，包括禁毀書院帶來的實質的傷害，以及中央政府公開宣示王學與官方意識形態

之間的扞格、矛盾，一再窄化王學的生存空間。也因此，在京師這種政治敏感度甚高的地方，附和王學的人會很快轉向其他學術勢力，《求是編》在此風潮下，身價也迅速水漲船高。本來是族人不故作序，如今竟人人爭借傳寫，中間不過短短幾年的時間，時勢之變易，實不可同日而語。

更進一步來看，在政治正確的考量下，人們也開始意識到王學門人在科考上處於不利地位的情形。因與官方意識形態不同而對科考不利問題，在張居正在位的十年中是相當明顯的，即使後來明神宗親政，整個問題看似雖較緩和，但仍未得到解決，王學自始至終都未取得中央政府的認同。晚明東林學派的健將高攀龍（1562—1626），曾上〈崇正學闢異說疏〉，^⑫希望朝廷一意崇尚程朱正學，黜落程朱學以外的學術，並在萬曆二十年（1592）得旨允行。我們不難想像當時王學所遭遇來自政治上的壓力與其爭議性。

除了外在的政治壓力，以及其他學術勢力的競爭外，更大的壓力還來自吉安內部。自明初以來，吉安一直都是科舉考試的常勝軍，科考文風的盛衰更是全府命脈所繫，而培養子弟繼續取得高級功名，則是仕紳所共同期待的。如學者羅倫，據說他十五歲入學有志於聖賢之學，便曾說過「舉業非能壞人，人自壞之耳」之類的話。^⑬

當王守仁駐守南贛，引進異於吉安傳統學術的新學術，吸引大批年輕士人前往從學時，也有家庭因對其存有疑懼之心，禁止自己的子弟仿行，有個有趣的例子：

正德丁丑陽明王先生以都御史督軍虔南，日與士人談學，於是虔吉士人多出門下，吉水國子生龍履祥將往，其父北山翁怒罵曰：「是皆飾虛名誑人者，汝何得爾。」廢食偃臥不起，履祥至涕泣請不輟，不得已許之。^④

對新學風不熟悉而生疑的結果，父親龍光甚至「廢食偃臥不起」，希望打消兒子的念頭。在講究孝道的明代，父親這樣的反應可算是非常激烈了，不過龍履祥沒有讓步，反而「涕泣請不輟」，逼使父親終於同意。從中我們不難看出王學對於年輕士人的魅力之大。事件還有後續：

履祥故修汰驕逸難近，數月歸，馴馴如處子，翁曰：「吾今乃知王先生。」因履祥以見，願執事終身。^⑤

從禁止其子從學，到自己「願執事終身」，龍光前後態度幾乎是一百八十度的轉變，同時我們也看到王學正逐漸被吉安仕紳所接受。

王學得到吉安仕紳的認同，宸濠之亂是一個分水嶺，包括如龍光「聞宸濠反」，王守仁南下吉安時，便「集田僅百十人傾賞備鎧仗以從」。^⑥而王守仁呼籲仕紳起事勤王，也得到此地仕紳不少支持。加上早期吉安的王學學者在科舉考試表現不弱，如羅洪先以狀元之姿榮登翰林，更是轟傳地方之盛事，而其不以功名為重但願做聖人的理想，更被士民所津津樂道，傳誦一時。^⑦因此，儘管王學的學術立場很明顯

與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程朱學不同，但王學不利於科舉的問題，此時似乎未成眾人注目的焦點。

然而，從嘉靖到萬曆數十年的時間，包括廬陵與吉安全府中舉人數與進士人數，都呈現下滑的趨勢。（參見圖一、二與圖三、四）單就廬陵一縣而言，嘉靖三十五、三十八、四十一年進士人數連續掛零，萬曆十四與十七年亦無斬獲，中舉人數自嘉靖三十七年後便逐漸走衰，至萬曆中期仍無起色。問題日漸嚴重。

吉安科考失利的時段，與王學進入吉安成為顯學的時段，二者很大部份是重疊的。於是，曾經風靡一時，吸引無數年輕士人參與講學活動的王學，到了萬曆年間卻漸失去在年輕士人心中的地位，曾同亭談到當時的情形：

國家學制視前代，其取士一以經術，……迺其後也，士或急於榮名，一切工程式之文以希進取，卒之其言愈工，其所自得愈遠，……學士大夫有憂之，……於是間取堯舜周孔以來至於有宋諸大儒論性之旨，發明一二，以待術黨之士，蓋將佐其學校之教所不及。而牽文義守拘攣者見謂足以妨功而害進，群然叛而去之，甚者詆為玄虛，譽為禪寂者，紛如矣。^⑧

仕紳階層把王學講學視為「佐學校之教所不及」，這是一般談到書院講學時常見的说法，但另一方面，王學卻被定位為「足以妨功而害進」，士人甚至「群然叛而去之」。仕紳與年輕士人之間觀念的鴻溝明顯可見。

因此，在禁毀書院的風波告一段落後，儘管被毀的書院重建，知府余之禎又參與西原講學，但此時王學在地方上的影響力卻已開始下滑，在不利科考的陰影籠罩下，王學學者必須尋找解決的辦法。針對如何提振文風的問題，時人至少提出兩項對策，一是興學，一是風水，而兩說又共同指向白鷺洲書院。白鷺洲書院這間歷史悠久且是江西三大書院之一的建築，對於吉安士人自有一種不可言喻的感情存在，若欲興學，首應重建書院。若言風水，書院本在沙洲上，繫一縣甚至一府文風之盛衰，一邊便壞風水，故須恢復舊觀。^⑦二說合流，自然出現把書院遷回故址的呼聲。

書院議題，從單純的學術之爭，擴大變成與地方科考有關的事件，而原本立場常與王學學者相左的知府，面對科考的問題，態度也不得不變。等到萬曆二十年（1592）新任知府汪可受就地方文教事請教王時槐時，王時槐遂趁機進言重建白鷺洲書院事，雙方的合作於焉展開。^⑧

白鷺洲書院自嘉靖十七年（1538）遷離後，已歷四十餘年，故址也已荒蕪不可用，這次遷建等於興築一座新的書院，且須預修堤防以防水患，所費不貲，財源如何籌措頓成棘手問題。經過禁毀書院與查緝官員挪用公款私創書院的風暴後，官員似乎在這類事上收斂許多，包括錢一本重修書院的開銷，都是從自己的薪俸中支出。值此財政困難之際，我們看到王學學者如安福鄒守益之子鄒善、永新甘雨為此奔走，向地方士人、仕紳募集經費，^⑨據說整個工程做到「帑不費公，調不程民」^⑩的地步。

從嘉靖十七年（1538）何其高遷書院始，經歷三朝半個多世紀的時間，書院終於回歸舊址，吉安的王學學者心中不無感歎，而對何其高的功過評價至此亦可蓋棺論定，習孔教說：

余自為諸生時，則聞書院之沿革備矣，……議者謂洲浮沙偏水，遷徙不常，奈何與水爭地，故何抑之（何其高）舍洲而陸，見為一時長慮，而不虞之規為學宮也。夫海水揚塵，陸陵起浪，天地之變巧歷不能窮，即陸處可常侍乎？閱宋迄今日，無慮數百年，而書院之於洲不蕪廢也，則信乎起廢由人力矣，何乃罪地脈哉？^⑪

甘雨更毫不留情的指出：

厥後院徙洲蕪，水衝氣洩，閭郡人文一蹶而不復振，……避小害而妨大德，宜必有任其咎者。^⑫

何其高遷徙且欲控制書院，若從事後論定，是造成後來紛紛擾擾的最大禍源。

五、小結

書院從遷離到遷回，由盛而衰而復興，在這個過程中，吉安王學學者一方面在白鷺洲書院的主導權上與官方時有緊張關係，一方面又在科考失利的壓力下尋找振興文風之道。

在主導權的問題上，面對王學這個吉安的主流學術，知府儘管使出遷廢書院的手段仍未能佔到優勢。但嘉靖以來廬陵甚至全府科考失利的危機，則是所有人必須共同面對的問題，因此雙方最後選擇合作，重新修復白鷺洲書院。

書院的修復雖是在王學學者負責募款的情形下完成的，但在重振科考的名義下，一切以科舉為重，書院也就變成專門修業科舉的場所，而如王學這種被人視為「足以妨功而害進」的學術，則不得不退到邊緣的部份。在汪可受強勢主導下，包括祠祀的內容也作了改變。白鷺洲書院在宋元兩代原本都有專祠祠祀周敦頤、張載、邵雍、二程、朱子等六人，號六君子祠，明正德年間書院重建完成後，又建陽明祠，此後陽明祠特著，六君子祠則日漸荒廢。汪可受利用書院重建的機會，詳請釐正祀典，不僅建先賢祠祠祀二程，也把羅倫、羅欽順編入祀典配享。^⑭相較於過去正德、嘉靖年間的情形而言，王學已不再享有獨尊的地位。

從我們所能看到的資料顯示，此時的白鷺洲書院已經變成知府或其他官員講學的場所，^⑮而王學的講學活動雖然也可利用此地舉行，但時勢變易已今非昔比，士人甚至可能在旁竊笑鬧場，因此汪可受特別在所訂十二條館例中禁止這種行為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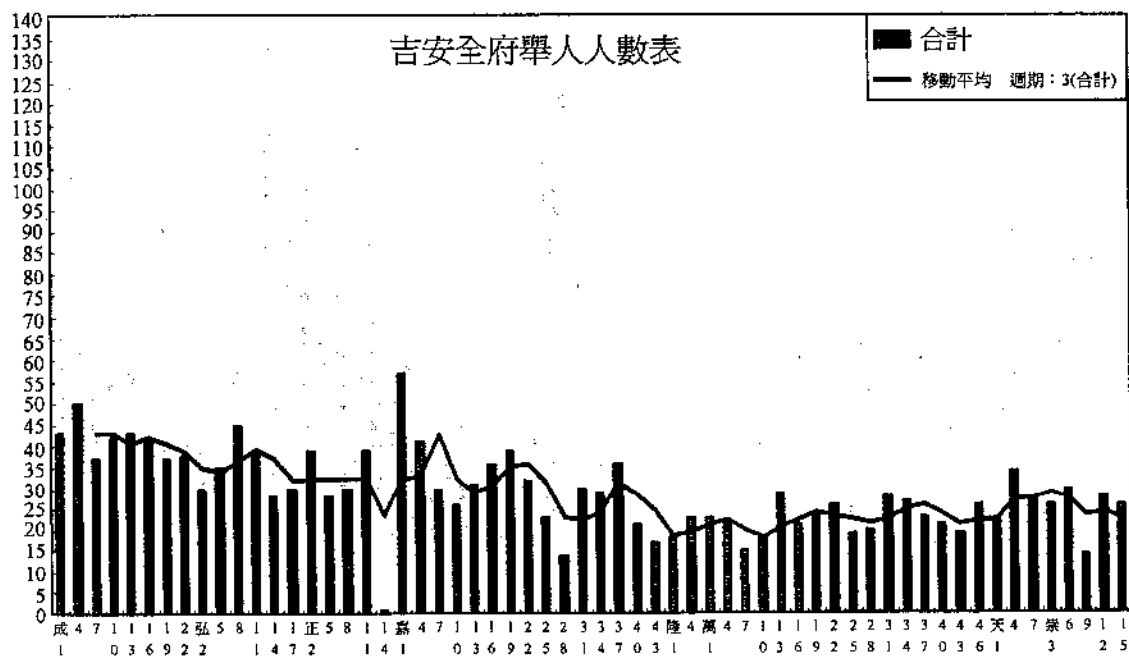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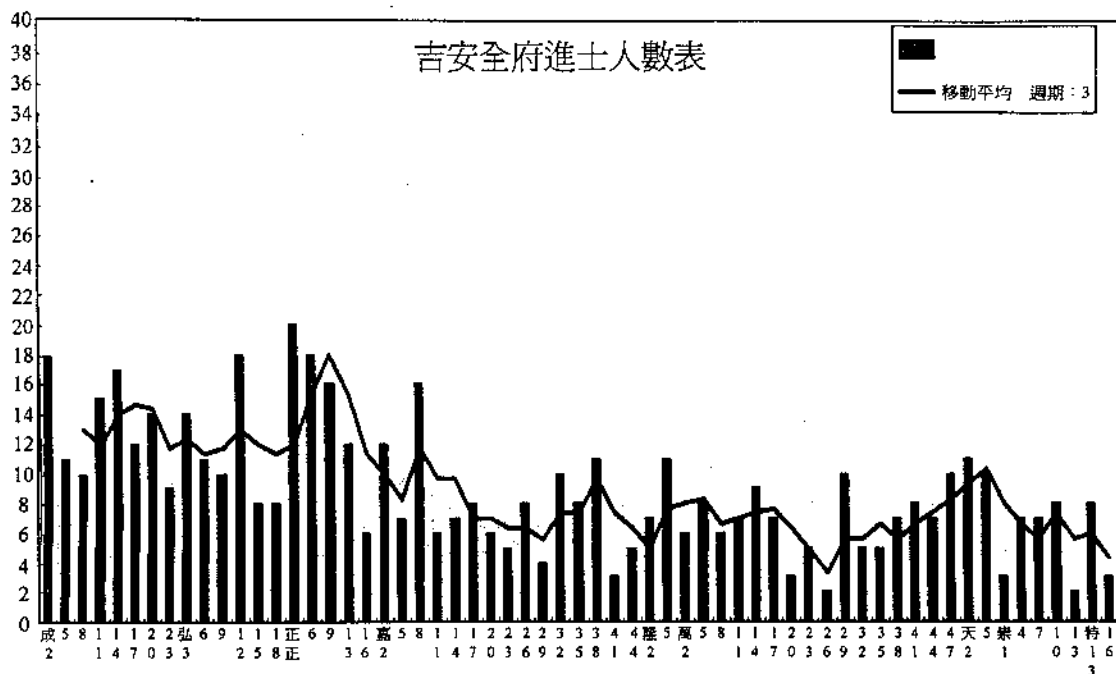
今後鄉先生有理學雅會，諸生須知敬聽，其未發心於此道者，止宜閉戶習讀章句，不得旁觀竊笑以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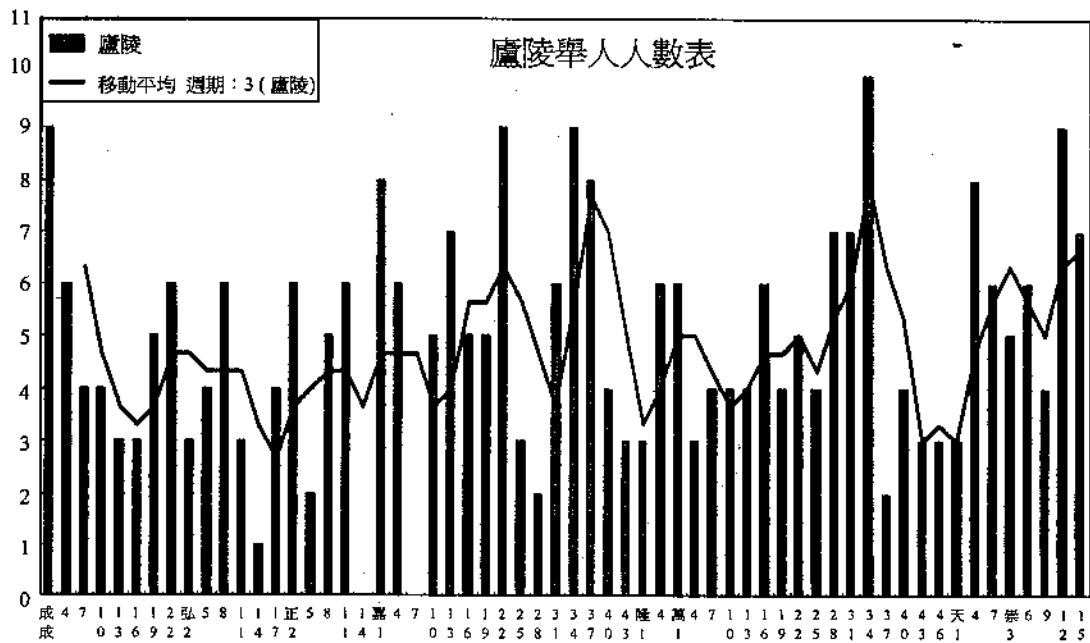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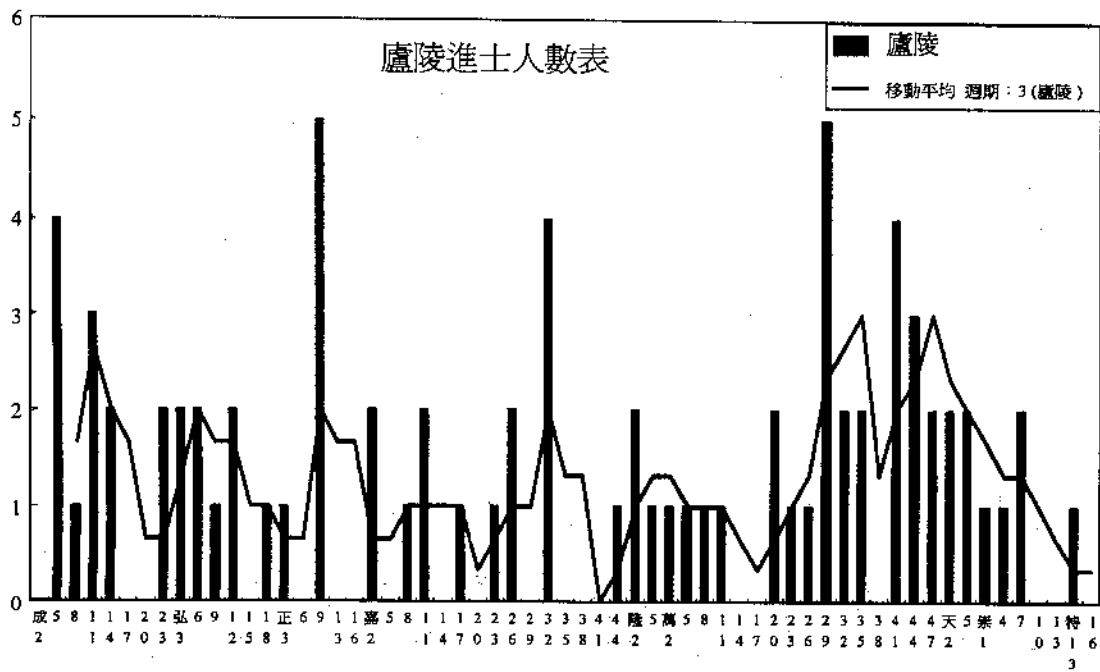
浮蕩。^⑯

白鷺洲書院的教育主導權，很明顯已經易手給官方。另一項具指標性意義的是當時官方「增置青、西二原膳會之田以供餼」^⑰一事。青原講會與西原會館都是屬於王學學者私人講學的空間，在禁毀書院的風波中，兩會正因獨立於官方系統之外而能夠保持完好並且正常運作，如今卻定期接受官方資助，且甚至為其立碑頌德，^⑱顯示青原講會也漸被吸納到官方系統中。

從整個大環境來看，吉安王學的學術地位正漸走下坡。自王學的第一代弟子如鄒守益、羅洪先、聶豹等人相繼去世後，轟動一時的青原、復古兩會已漸消沈黯淡，^⑲昔日天下學者景附雲從、四方從學之士絡繹不絕於道的盛況，亦不復可見。進入十七世紀，以蘇州無錫為中心的東林學派崛起，東林書院隱然成為新的學術中心，吉安的學術宗主地位很明顯已被取代，儘管天下四大書院中，吉水鄒元標主持的仁文書院仍佔有一席之地，但與日正當中的東林書院相較，卻已是夕陽薄暮之勢。

於是，隨著王學在吉安的退潮與沒落，尤其科舉失利的沉重壓力，使得書院逐漸走向官學化一途，昔日曾經盛極一時的青原、白鷺講學不復可見，而吉安也走入了另一個階段。





廣德州志	清乾隆五十九年刊本	舊復初書院：明嘉靖初判官鄒守益所建者，即以尊經閣為之。萬曆間禁立書院遂廢。(頁581) 舊復初書院田：(楊志)明嘉靖初判官鄒守益置膳田參百餘畝，供四方來學，資諸生紙筆燈油婚喪及修書院用。二十年，督學馮天馥檄王杏穀之。萬曆十年禁書院，田俱鬻于民間。十二年知州陸長庚捐俸贖還學田，後歸督學項下。(頁607)
寧國府志	明萬曆年間刊本	志學書院：在府治北景德寺後，嘉靖甲子提學御史耿公定向、知府羅汝芳、推官李惟觀建，中為大堂，後為會講堂，各五楹，左右號舍四十楹，大學士李公春芳記。前為門三楹，萬曆乙亥知縣姜奇方建。(頁851) 水西精舍：在實勝寺之右，嘉靖壬子督學御史黃公洪昆、知府劉起宗、知縣兵時□建，祭酒鄒守益、脩撰羅洪先、給事周怡並有記。嘉靖壬戌知府羅汝芳益增葺之，學田四十畝，地一百畝，隆慶丁卯知縣劉世亨置，王廷幹記。(頁863) 文峰書院：在縣治南，嘉靖中知縣丘振建，癸卯知縣劉元凱脩，萬曆己卯奉旨，改迎恩公館。(頁872)

池州府志	明萬曆四十年刊本	駐節公署：在齊山寺左，萬曆間兵備副使馮敕吉建，中為又來堂，後為得樓，有門有坊，初亦扁為齊山書院，因張江陵毀天下書院，遂易今名。(頁277)
徽州府	吳景賢《安徵書院志》，收入《中國歷代書院志》。	紫陽書院：紫陽書院，在縣治後保安山上三賢祠。三賢祠始自宋淳熙八年(一一八一)縣令周師清建，祠周濂溪程道伊川三先生也。明嘉靖九年(一五三〇)知縣曾忭，毀縣治後保安山之保安寺為書院，易晦菴之名曰紫陽。三十三年(一五五四)知縣鄭國賓置田二十畝，四十一年(一五六二)張橫置田四十畝，為講學會文費。張居正柄政時拆毀。(頁13-4)
杭州府志	清乾隆四十九年刊本	天真書院：在天真山麓，王天成守仁講學之所。萬曆間行人薛侃等建，以祀文成，舊名天真精舍，在天龍寺之左。嘉靖九年僉事王臣與揭陽薛侃、

紹興府志		
明萬曆年間刊本		
稽山書院：在臥龍山西岡山陰地。宋朱晦菴氏嘗司本郡常平，事講學，倡多士，三衢馬天驥建祠祀之，其後九江吳革因請為稽山書院，歲久湮廢。明正德間知縣張煥改建於故址之西，嘉靖三年知府南大吉增建明德堂、尊經閣，後為瑞泉精舍，齋廬庖湢徵備，時試八邑諸生，選其尤者升于書院，月給廩餼。萬曆七年奉例毀書院，遂為吳氏所佃，賴尚書兌持之，不遽毀。十年知府蕭良幹來，始復而修之，改名朱文公祠，又即瑞泉精舍址建一堂，題曰仕學所。（頁664—665）	會稽錢德洪、王畿、金鸞寺僧地創建，中為祠堂，後為文明閣、藏書室、傳注樓，置膳田以待四方學者。萬曆二年侍御萬安蕭公按浙，增建凝道堂。八年毀天下書院，而精舍亦混為里中所佃。十一年蕭公督撫兩浙，與侍郎江陰范公為請于朝，禮部議復祠田，仍賜祠額，有司春秋致祭如禮云。	（頁343）
五雲書院：雲衢書院，在東雙橋東會稽地，亦萬曆七年廢。十二年知府蕭良幹重修，改名五雲館。（頁665）		

饒州府志	清康熙二十二年刊本	東山書院：舊在羊角峰崖。宋趙汝觀建，與汝愚子崇憲師事朱文公熹于此，汝愚卒，熹來吊，復館焉，後為人所據，邑人李榮庭贖之，謝枋得記，兵燹。明知縣沈時重建於絕頂，邑人參政劉憲記，後廢。正德間巡撫任漢命知縣徐冠復建，提學李夢陽記。萬曆庚辰議廢，旋復建。(頁543—544)
南康府志	清康熙六十年刊本	陳經歸書院：在西山。明弘治間知縣王珀奉建，祝文祭品皆奉頒。正德四年知府陳霖買祭田五畝，正德六年知縣徐冠建擇坊於道院，提學李夢陽書額。萬曆間張江陵燬書院，改名雲住祠，今復舊名。(頁310)
廣信府志	清康熙二十二年刊本	端明書院：舊在縣治東，宋狀元汪文定公故居也。元監縣壽安為建書院，置學田，給費，有蘇天爵記。後毀地為湖東道。明景泰間知府姚堂改祠於城隍廟東，有李奎記。正德辛巳御史唐龍命知縣潘文明重建。萬曆庚辰奉例改革書院，知縣周日甲更置端明祠于縣西馬院巷，汪氏居焉，祠今存。(頁995)

清乾隆四十八年刊本

象山精舍：宋淳熙十四年陸子靜講學應天山，易名象山，建精舍。：明景泰間巡撫韓雍命知府姚堂重建，又置田以供歲祀，正德辛未提學副使李夢陽增建門堂坊扁，知縣謝寶復即祀後建仰止亭。嘉靖癸卯知縣袁鳳鳴增修，丙辰提學王宗沐講學其中。萬曆八年奉例廢書院，知縣伍袁革改為象山祠，尋奉例通復。然書院北向，傳李魯謂講古習禮之地而先師北面，學者南面而拜之，非禮也，宜擇南面之地，卒不果，今仍為象山祠。（頁808—809）

玉溪書院：在縣南盧坊，宋儒盧孝孫講學處。元季兵燹。明宏治間提學黃仲昭訪求故址，檄知縣章厚重建，鄭節記，歲久圯。嘉靖丙戌知縣葉良佩規地於縣治東一里許遷建，內為祠堂，外為講堂。丙辰提學王宗沐率諸生釋菜焉，訪其後裔盧元盧嘉會優禮之。戊午署縣主簿郭德茂捐修，特藝石以系其世。隆慶元年署縣同知廖文光復修。萬曆八年廢書院，祭亦裁革，盧元率嘉會子改為玉溪祠，後書院通復，三十八年知縣錢邦偉申請復祭，增編祭銀，復加造堂一區為講學之所。（頁810—811）

		錦江書院：在上清。元翰林待制倪鏜講學處。鏜居安仁，故以錦江為號。至元間奉朝請敕賜額名，本邑與安仁（按：饒州府所轄縣）並建。明萬曆七年奉例概廢。至萬曆四十年本族嗣人與安仁、東鄉二族以先朝敕額請於知縣錢邦偉，復為鏜祠，趙孟頫有歌。（頁812）
	天下書院總志	懷玉書院：明成化間仍建書院，清復原田。正德間提學李夢陽重建。既而宸濠兵變，復為僧踞。嘉靖間提學王宗沐以左道宜斥請於撫按，檄有司改復書院，悉如白鹿洞制，置書院田三十三頃以贍學者，自後知府姚體信修之。萬歷辛巳詔革天下書院，遂廢。（頁369—70）
瑞州府志	明崇禎元年刊本	筠陽書院：略曰：…至萬曆初載□改者喜紛□議毀書院，筠□在革中，予時□太恭人憂，□然太息曰：茲地□昔予麗澤之所，何忍淪落市□而莫可□復哉？遂捐貲二百餘金抵其值，越□年歸于郡邑，置原值不問。（頁534）

南安府志	清同治七年刊	道源書院：在大庾縣學東。：明初更為大庾學，學後為祠。正統二年併學於府學，而書院殿閣堂齋俱圯。景泰四年知府金潤重建。成化元年知府姚旭、大庾知縣夏璣重修，侍郎葉盛記。宏治十三年圯於水，十六年知府盧濬興復之。正德十五年知府何文邦益增其制，：嘉靖二十八年知府陳堯再新之，萬曆間廢，後詔復天下書院，巡撫御史陳效捐貲，知府宋萬葉、推官鄭道興、知縣劉宦成擇今址重建，東至官地，南至街，西北至縣學。（頁297—299）
吉安府安福縣志	清同治十一年刊	復古書院：即儒學舊基，在治東里許，明嘉靖十五年知縣程文德建。：四十年邑人尹一仁、劉陽新修院志，隆慶間知縣李忱重修尊經閣，邑人劉陽記。萬歷七年毀天下書院，九年易名三賢祠，後知縣閔世翔奉詔復舊額，增置田租，邑人傅應禎記。（頁304—5）
永豐縣志	清同治十三年刻本	一峰書院：在縣治西，儒學右。明宏治間督學邵寶屬吉安府知府張宗厚創建，邵為之記。萬歷初張居正奪情起復，命所司撤祠，以有扶植綱常一疏也。壬辰知縣吳期炤復之。（頁348—9）

《白鷺洲書院志》	白鷺書院：按書院遷郡城北隅後，江陵張居正柄國，下令悉毀天下書院，有司莫知所出，始題其門曰：湖西公署。後居正敗，乃復稱白鷺書院。（卷一，頁8）
天下書院總志	仁文書院：在縣東門外，明知縣徐學聚建為鄒元標講學所。萬歷中毀，尋復。（頁657）

《註釋》

- ① 臺灣大學歷史所博士班研究生
- ② 嘉靖十六、十七年，明世宗也曾表態而撤毀湛若水講學的書院，但未有進一步的行動，影響範圍也僅止於此而已。可參考王崇峻，《明代書院講學的研究》（國立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93）。
- ③ 如與王守仁曾有激烈論辨的著名程朱學學者羅欽順，因為不喜吉安王學當今的風氣，晚年家居甚至足不下樓。而原本傾慕程朱學的如尹臺，中年亦轉向王學，且積極創建書院講學。過庭訓，《本朝分省人物考》（明代傳記叢刊本），卷六十七，頁2，及卷六十八，頁27—9。
- ④ 黃宗義，《明儒學案》（台北：里仁書局，1987），頁

333。

⑤郭子章，〈科第志補序〉，《續衣生黔草》，在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集155（台南：莊嚴出版公司，1997），卷十八，頁23—4。

⑥《明儒學案》，頁1106。

⑦《永豐縣志》（清同治十三年刻本），收入《中國方志叢書》（台北：成文出版社，1989）華中760，卷11—11，〈儒林〉，頁16—8。

⑧《王陽明本傳》，《王陽明全集》（台北：大中書局，1983），頁3。

⑨可參考呂妙芬，〈陽明學派的建構與發展〉，《清華學報》29.2（1999），頁167—203。

⑩當時提學副使邵銳、巡按御史唐龍，持論都與王守仁不同，因此「戒諸生毋往謁，諸生多畏避」，而魏良弼、良政、良器、良貴四兄弟「獨不顧，深為守仁所許。」魏氏兄弟是當地望族，得其支持，王學得以在此立腳。見《江西通志》（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），卷六十九。

⑪我曾赴大陸上海圖書館與江西省圖、吉安縣圖等圖書館，尋找吉安現存族譜，但所獲不多。據曹國慶先生與梁洪生先生告知，許多族譜仍然存在農民家中，必須作田野工作才能得見。因此儘管從方志與文集資料中，不難看出家族

與王學確密切關係。曹國慶先生表示，吉安家族勢力至今仍然很強。但苦於資料有限，目前難作更深入的討論。

⑫《吉安府志》（明萬曆十三年刊本），收入《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》30，卷十一，頁7。

⑬《安福縣志》（清同治十一年刻本），收入《中國方志叢書》華中773，頁310。

⑭《王陽明年譜》，《王陽明全集》，頁76。當時學者經常往來青原、白鷺之間，而以青原講會為主，講學活動也最盛，所以我把青原、白鷺都定位為府級的講學中心。

⑮羅洪先，《念菴文集》（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），卷十三，〈東川先生行狀〉，頁13。

⑯《泰和縣志》（清乾隆十八年刊本），收入《中國方志叢書》華中838，頁327—30。

⑰曹松葉，〈宋元明清書院概況〉，《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》，第111—115期。

⑱這個推斷並無直接證據可資佐證，我主要是參考清初的資料，據說康熙五年施閏章在白鷺洲書院講學時，「士人病涉」，因此在仁壽山上另闢景賢書院講學。見《天下書院總志》（台北：廣文書局，1974），頁623。

⑲同前書，頁614。

⑳尹臺，《洞麓堂集》（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），卷四，頁

54。

④耿定向，《東廓鄒先生傳》，《耿天台先生文集》（台北：文海出版社，1970），頁1433、1442。

⑤《白鷺洲書院志》，卷五，頁22。

⑥同前書，卷首，頁二。

⑦《吉安府志》（明萬曆十三年刊本），卷十五，頁7：「嘉靖壬寅郡守何其高移建于城南仁壽山，隆慶辛未改為廬陵縣學，以舊學文廟尊經閣為白鷺書院，尋廢。」

⑧羅洪先，《答王龍谿》，《念菴文集》，卷三，頁26。

⑨James B. Parsons, "The Ming Dynasty Bureaucracy: Aspects of Background Forces," in Charles O. Hucker ed., *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: Seven Studies* (New York & London: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, 1969), pp. 175—227.

⑩鄒守益，《東廓鄒先生遺稿》，卷五，頁12—3。

⑪胡直，《念菴先生行狀》，《衡廬精舍藏稿》，卷二十三，頁9、16—8。

⑫《吉安府志》（明萬曆十三年刊本），卷十七，頁9—10。

⑬同前註。

⑭可參考如盛朗西，《中國書院制度》（台北：華世出版

社，1977）。李國鈞主編《中國書院史》（長沙：湖南教育出版社，1994）。樊克政，《中國書院史》（台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95）。陳谷嘉、鄧洪波主編，《中國書院制度研究》（杭州：浙江教育出版社，1997）。

⑮曹松葉，前引文。

⑯也有幾位學者針對這個問題做過研究的，如李才棟在《江西古代書院研究》（南昌：江西教育出版社，1993）中考察江西全省被毀的書院，認為共有十九所，分別是：紫陽書院、明經書院、東山書院、疊山書院、懷玉書院、象山書院、玉溪書院、白鹿洞書院、濂溪書院、綿江書院、道源書院、一峰書院、復古書院、白鷺洲書院、筠陽書院、錦江書院、復真書院、文江書院。與本文統計結果稍有出入。其中紫陽書院與明經書院均在婺源境內，明代屬於南直隸轄區，列入江西不妥。而從資料來看，白鹿洞書院明顯沒有被列入禁毀名單中。疊山書院、濂溪書院與綿江書院，在府志與縣志都未見被毀的記錄。白鷺洲書院當時已改名白鷺書院。另外，江西圖書館藏有《復真書院志》，目前未能得見，而根據方志資料來看，也沒有被毀的跡象。

⑰《杭州府志》（清乾隆四十九年刻本）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史部701，卷十一，頁26。

③⑤《明實錄》，卷一四二，頁5。

③⑥張居正禁毀書院，當然不會只是為了官員私挪公款的問題而已。這應只是原因之一。真正的關鍵恐怕還在於張居正與王學學者之間的心結，以及彼此在學術立場與政治主張上相扞格所致。可參考章慶遠，《張居正和明代中後期政局》（廣州：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，1999）第十八章討論張居正執行文化專制政策、壓制王學的部份。

③⑦以上見《萬曆邸鈔》，頁81—82。本資料感謝唐立宗先生提供。

③⑧《明實錄》，卷一四二，頁5。

③⑨《白鷺洲書院志》記載：「按書院遷郡城北隅後，江陵張居正柄國，下令悉毀天下書院，有司莫知所出，始題其門曰：湖西公署。後居正敗，乃復稱白鷺書院。」卷一，頁8。

④⑩《永豐縣志》（清同治十三年刻本），頁548—9。

④⑪《吉安府志》（清光緒元年刊本），收入《中國方志叢書》華中251，卷十三，頁23。

④⑫王時槐，《重修白鷺書院記》，《白鷺洲書院志》，卷五，頁22—24。

④⑬以上見馮煒，《福建學道崇正堂翻刻求是編序》，在馮柯，《求是編》，頁13—16。

④⑭《明儒學案》，頁861、975。

④⑮高攀龍，《高子遺書》（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），卷七，頁1—7。

④⑯《永豐縣志》（清同治十三年刻本），頁1072。

④⑰羅洪先，《直隸州滁州判官北山龍君墓誌銘》，《吉水縣志》（清道光五年刻本），收入《中國方志叢書》華中776，頁3116。

④⑱同前註。

④⑲同前書，頁3117。

④⑳《明儒學案》，頁388。

④㉑曾同亨，《泉湖山房稿》（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刊本），卷十三，《吉水縣重修儒學記》，頁3—4。

④㉒當時王學學者也有人篤信風水形家之說，如曾同亨。而甘雨在《重修白鷺洲書院募勸疏》中，也指出嘉靖以來廬陵科考失利與風水的關係：「當在洲時，章縫塞墊，主組盈朝，忠勳接踵於旂常，耆宿肩摩於藪澤，人文炳烺，幾當縣寓之半，何其盛哉！嘉靖以後，浸失故額，乃今則有大謬不然者。議者謂大江浩淼，州踞其中，負青螺而揖天玉，神岡在盼，二華為輔，章貢瀘禾諸水遠近合沓繞出州前，其形勢為特勝，文忠即洲建院，攬其勝而置之几硯之間，地與人相得而章，盛有由矣。厥後院徙洲燕，水衝氣

洩，閩郡人文一蹶而不復振，豈青矜譽髦直不前人若哉？避小害而妨大德，宜必有任其咎者。」《白鷺洲書院志》，卷六，頁25。

⑤ 甘雨，〈重修白鷺洲書院募勸疏〉，同前書，卷六，頁26。

⑥ 在〈題名記〉中記載：「謀始則太常王先生（王時槐），義勸則太常鄒先生（鄒善）及劉駕部道明、龍少泰君揚、張少參汝揚、萬憲副汝唯、劉太參質之、賴太參貫念、張僉憲應貞、毛上林喬甫、龍孝廉才卿，而首議區畫則甘督學子開（甘雨）之力尤多，……」喻均，〈重修白鷺洲題名記〉，同前書，卷五，頁31—32。

⑦ 劉應秋，〈重修白鷺洲書院記〉，同前書，卷五，頁26。

⑧ 習孔教，〈十學號房記〉，同前書，卷六，頁6。

⑨ 甘雨，〈重修白鷺洲書院募勸疏〉，同前書，卷六，頁25。

⑩ 〈崇祀〉、〈書院祠祀緣起附〉，同前書，卷一，頁12—20。

⑪ 如曾同亨在寫給知府張鳴鶚的序中說：「後先改建吉水、廬陵、永新三學宮，群諸士之雋者於白鷺書院，躬自課督。」（〈贈郡侯雲臺張公入觀序〉，《泉湖山房稿》，

卷六，頁20）而另外談到分守湖西左參政黃承元時也說：「政暇間一造白鷺精舍，延見縉紳，相與談說道德，彬彬多所興起。」（〈贈藩伯與參黃公考績序〉，同前書，卷七，頁12）至於巡按吳達可則「按行吾郡，集郡紳弁以下偕監司守令及諸博士弟子聚講于鷺院，業成令規。」劉日升，〈青原振學頌德碑記〉，《慎修堂集》（明泰昌元年刊本），卷十四，頁5—6。

⑫ 《白鷺洲書院志》，卷二，頁11。

⑬ 劉日升，〈邑侯成都天敕莊公遺愛記〉，《慎修堂集》，卷十四，頁17。

⑭ 劉日升，〈青原振學頌德碑記〉，同前書，卷十四，頁9。

⑮ 青原會在鄒守益去世後，曾有一段低潮期。《明儒學案》記載：「初先生（劉元卿）遊青原，聞之與人曰：青原詩書之地也，笙歌徹夜，自兩鄒公子來，此風遂絕。兩公子者，汝梅、汝光也。」（頁498）汝梅、汝光皆鄒守益孫，所謂笙歌徹夜，應非王學學者所樂見的。而鄒元標也談到：「吾輩在此一堂講學，所親就者大人，不虛心受益，卻是狎大人。所講究者聖言，不虛心體貼，卻是侮聖言。記得少年時在青原，當時我邦濟濟大人在席，今皆物化，蹈狎大人之弊。」（頁555）學風之衰是很明顯的。